

全面抗战时期的西南边疆区域政治：以云南为中心 (1937—1945)¹

段金生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4)

【摘要】：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央与云南地方实力派人物龙云之间的复杂关系演变，是这一时期西南边疆区域波诡云谲政治形态的重要内容。七七事变爆发初期，龙云派遣滇军出战，与蒋介石关系仍属相安。伴随全面抗战日渐深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央与龙云围绕政治、军事权力诸方面展开了复杂博弈。虽然1938年7月龙云武汉之行暂缓了双方矛盾，但12月19日汪精卫由昆明出走河内，蒋介石对龙云猜疑日深；而龙云对蒋介石不断压缩地方实力派的生存空间的反击也日渐强硬，双方关系走向分裂，最终发展为蒋介石以武力改组云南省府。这一“非正常”的央地关系形态折射了国民党政权的脆弱性，呈现出近代国家建设的艰巨历程，也彰显了西南边疆与国家发展荣辱与共的时代主题。

【关键词】：全面抗战；蒋介石；龙云；央地关系；边疆政治；云南

【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23)09-0074-12

DOI:10.13713/j.cnki.cssci.2023.09.015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蒋介石早已注意经营西南，在1934年借机派遣中央参谋团入川，又于1935年成功改组贵州省政府，西南边疆的政治形态、地缘格局均发生重要变化。一方面国民政府中央增强了对西南边疆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也引起龙云、刘湘等滇川地方实力派的警惕，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央关系更趋复杂。自民国以来，四川地方实力派一直纷纭杂沓，至二刘之战后才逐步趋于稳定，刘湘逝世后四川又逐渐被纳入国民政府中央轨道。与川黔相比，云南自袁世凯统治结束之后，第一、二代地方实力派虽有更迭，但较为稳定，且一直存在至国民党政权瓦解为止。研究云南地方实力派与国民政府中央关系的演变，在某种程度上可进一步窥探民国西南边疆区域政治的复杂演变。

关于蒋、龙关系，一直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论是专题论文，还是研究专著，抑或西南地方通史性论著，对此均有关注。¹既有研究或侧重于宏观叙述，或侧重于某一具体事件的讨论，或论述其他议题时兼有关涉，均从不同视角对蒋、龙关系作了深入探讨。笔者曾撰文对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时期龙云的言行进行过探讨，²近年在梳理、研读相关文献资料过程中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又有所深化，故本文拟结合自身陋见，在前贤既有研究基础之上，以蒋、龙居于不同身份的政治利益诉求为主线，以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历史脉络为主要场景，对双方在政治、军事诸方面的合作与博弈进行勾勒，以期从整体上呈现在国家危难的历史情境下西南边疆区域复杂的政治面向。文中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七七事变后龙云的抗日态度及蒋对龙的争取

¹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南京国民政府与滇川黔地方关系研究”(14CZS055)。

作者简介：段金生，云南民族大学科技处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政治史、边疆民族史。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决定“对各省主管征求意见”，³经过统筹协调，定于8月7日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

在七七事变之后，虽然龙云当时也表示拥护国民政府中央，但据李宗仁言，龙云对蒋介石能否坚持抗战是心存疑虑的。⁴龙云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和发展的需要，在上台初期不得不追随蒋介石。但是，作为地方割据势力的代表，他又不可能完全听命于蒋，“把云南视作自己当然的领地和势力范围，不允许旁人涉足”。⁵不过，龙云还是赶赴南京。在维护地方政治势力与国家利益之间，龙云选择了后者。⁶

8月2日，龙云致电蒋介石，称“非集我全民力量，作长期抗战之计，无以救危亡”，表示对日全面战争开始后，云南可组织6万至8万的建制部队，赴前方支援抗战。⁷蒋介石表示令军政部统筹办理龙云的建议。⁷此时，龙云对国民政府中央的抗战态度并不清楚，他赶赴南京，一方面是基于国家大义的考虑，一方面也是想了解中央态度而决定下一步之行止。孙渡就认为龙云赴京，“在目前时机实属必要”。⁸龙云也表示：“中央内容不甚明了，故亲赴京一视。”⁸龙云于8月9日抵达南京。在国防会议召开的当天，蒋介石还在思考应如何对“川滇之处置”，³对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态度相当重视。

此次南京之行，是龙云掌握云南地方最高权力后第一次入京，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据龙云回忆，蒋在面见他时提出云南派遣两个军参加抗战，他表示可以先出一个军，另一个军则要视战争情况而定。⁹在8月12日、15日，龙云先后在不同场合表示支持抗日的态度。12日，龙云称：“滇省军队早经整理就绪，随时皆可为国家而效命也”。15日，又表示：“大敌当前，必须举国上下一心，团结御侮”。¹⁰这些言行表明龙的地方意识服从了国家大局。

龙云回昆后，随即召集云南地方军政负责人，进行抗战的相关部署。9月28日，何应钦致电龙云，称其“就滇省退伍壮丁征集六万至八万之数，组成建制部队增防前方”之议，因“饷糈器械，急切均难筹拨”，故“似可转令作为□□补充野战及后方补充营之用。”⁸何应钦改变之前蒋介石同意龙云将云南退伍壮丁组成军队建制的建议，不可能不与蒋介石商量。蒋作为国民政府实际的最高领导人，之前对龙云组军建议的同意，是从国家战略层面肯定龙云的抗日态度以获取其支持，但具体的战术部署考虑并不完备。其后的事态发展与蒋、何的设想并不相同，这反从另一维度说明了龙云对抗日的积极态度。

此时的对日问题关系着国家与民族存亡，为国人所共同关注。龙云作为一省之最高当政者，不能不虑及于此，他对抗日问题亦有较深认识。9月4日，他建议蒋介石应将所有精锐部队及重要武器分期使用，明确判断“中日战局，就管见所及，以持久战于我方有利”。⁸这一建议，得到了蒋介石赞同。⁷然而，战事迅速发生变化，之前何应钦对龙云主动组军作战表示委婉拒绝之意，很快蒋介石又急切要求“滇省军队，务望从速出动为盼”。⁷蒋在9月5日甚至表示：“兄(指龙云，引者注)部何日出发，务望于下月中能集中常德，如何?盼详复。”⁸对于蒋的焦急催促，龙回答称其“筹画人员武器之补充与人事之调整，已有端倪”，但军需军械物品筹备、部队官兵饷用、交通运费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困难，希望中央补助。龙云强调：“此次出师，滇省所有武器，虽由地方购办，然皆国家之力。”⁸龙云从南京回来后就组建六十军，由卢汉担任军长，下辖3个师。六十军于9月底组建完成，10月8日开始由曲靖、昆明分头出发，经贵州入湖南参与抗战。¹¹滇、川地方军队虽然表示出兵抗战，但蒋认为他们出发迟缓，内心不满，在10月2日的日记中称“川滇各部至此方出动，何怪各国观望”。³

客观而论，滇军出兵较迟虽然难免有一定的主观因素影响，但与云南地方实际情况尚相符合。龙云在10月9日给卢汉的电文中说明了此点：“抗日问题，早即料有今日。故于委座两次莅滇之时，曾面呈将来抗日所需滇军参加否?承答云：恐用不着。迨今年兄(指龙云，引者注)入京，见情势紧张，亦曾建议滇省可添练六万八万或十万，宜先筹划，以备不时之需，事毕负责解散，乃未蒙军政部采纳。继而突命出兵。此次马上组织六十军出发，已属竭尽心力。但若需要，再出十二团，亦尚可能。惟除此十二团及六十军之陆续补充外，如尚需多兵，则事前毫无准备，一时恐来不及。须请[中][央]指示方略，方能办理。”⁸揆之当时龙、卢关系，此电应是龙云对参与抗战行为的真实态度与思考。可以观察出，龙云主动提出组织军队出滇抗战，这一行为是在个人、地方与国家利益纠葛下的政治选择，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前面所引述的其回答蒋介石称云南军队出滇在经费上存有困难的真实性。不过，此时蒋介石急于希望滇军“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初到沪参战”，不断电催龙云令滇军兼程急进。⁸龙云接电后一方面回复蒋介石，一方面也电催滇军尽力“早到前方”。⁸

10月29日，卢汉抵达武汉，并于次日乘湘和轮到南京晋见蒋介石。蒋在接见卢汉时，要求云南还要继续出兵并先出12个补充团，龙云亲自到达南京进行商讨。⁸对于蒋的要求，龙云向卢汉表示，虽然云南准备的12个补充团已成建制，但还须训练并由军政部拨款接济才能成行。卢汉要观察“京中近日状况如何？外交联苏事有无成就？川桂军加入后，真相如何？”⁸龙云虽然支持抗战，但对蒋介石的部署、与各地方关系的变化等仍心存疑虑。

11月7日，已抵达南京的卢汉向龙云报告了各方对滇军的评价及上海战情，其中包括：一，各方均谓滇军素质优良，装具完全，具有相当训练；二，上海方面，我方运动困难；三，龙云曾电告中央，如前方需要滇军所存弹药，即运京应用。蒋介石接电后，将电文发交各部传观，称：“滇省素称贫瘠，能有此存储，深为惊异”，称赞龙云“公忠体国，光明磊落之态度，尤为全国所仅见”。⁸此语虽有鼓舞士气之意，但也说明滇军抗战得到了蒋的认可。

二、抗战初期龙云对时局的观察及蒋介石的对滇策略(1937—1938)

虽然按要求派遣了六十军出征，但龙云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是颇有看法的。1937年11月12日，龙云在给卢汉的电文中表达了对抗战准备不充分的不满情绪，称：“此次抗战，事前中枢一切准备，殊欠充实。自发动之后，除将士用命抵抗外，他无所表现。筹备未免过空，非常危险。目前只有尽力人事。国运如何，听之天命而已”。在前线不断失利的情况下，龙云认为，“南北战区，先后失利。影响之大，已不可思议”，称缘于“平时言而不行，养成恶习。且不开诚，有以致之”。此语实则是对蒋介石的责备，但他也强调“大势已如此，惟有积极准备”。龙云观察当时的全国抗战形势，认为“华北恐已非我所有，长江亦非安全之地”，惟有西南各省“可以支持耳”。但西南各省，“粤自顾不暇；桂则嚣张成性，外强中干；川则多头，毫无基础；滇(应指唐生智，字孟潇，引者注)则一无所持；湘(应指何键，此时任国民政府内务部部长，引者注)虽大有可为，惜无军权在握”，故“如滇健全者已属寥寥。今后责任之重，滇人当无法避免”。⁸龙云实含有对国民政府抗战组织不力的不满情绪，对滇省自身的看重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了其抗战决心。西南各省局势如此复杂，龙对蒋介石的态度则更加疑虑。11月24日，龙接到卢汉报告“于学忠附敌已证实”的消息，认为此“皆为中央欠于开诚，不起用汉卿之故也”。⁸虽然于学忠附敌为信息错误之言，但龙云的判断表露了对蒋介石的失望。

不过，龙云仍积极支持抗战。11月30日，蒋介石致电龙云，称：“望兄力促永衡率部兼程驰进，赴京增援”。龙云一方面表示已令滇军积极准备，一方面称蒋氏本人“关系国家安危”且负有“统筹全局之责”，应将固守南京之任务交由他人。龙云并要求卢汉加快进程，称滇军若能于此时加入前线，则“在最高领袖亲自指挥之下报效国家，实为千载一时之机会”，⁸表现了坚持抗战的积极态度。然而，很快南京失守，全国震动。龙云对此亦感忧虑，并试探蒋介石的抗战态度：“最近我军退出南京后，北平傀儡政府已发现，而俄尚沉寂无声。以后国策有无变更，目前如何进行，祈秘示，以资遵循”。⁸蒋介石表示：“抗战为既定国策，决无变更。目前国际形势，渐有积极征象。我苟艰苦撑持，必能日见好转。”⁸这或说明彼此并不信任，均担心对方态度发生变化而致局势混乱。

龙云十分关注时局走向。12月17日，龙在致卢汉的电文中对时局作了分析。首先，强调目前军事挫挫且南京失守，“一般意志薄弱之辈，心志难免不为之动摇”，“惟委座仍坚持其长期抗战之主张。其内容何所持，不特外间不知”。其次，假使南京政府崩溃，“于俄当大有不利”，或因“傀儡出现之故，激动俄国提前出兵，亦未可知”。“对外交倘毫无把握，早应谋妥协之计。计不出此，岂竟忍以全民族为孤注乎”，判断“不久必有总解决之日”。⁸这些表述反映了在复杂形势下龙云对抗日走向的认识，也透露出其与国民党另一高层汪精卫联系密切。

各方对抗日局势发展走向亦多有揣测。12月23日，龙云致电蒋介石，表示“坚持既定政策，贯彻始终，诚为目前之惟一救国途境[径]。假使稍变，不特外援绝望，内必因之而崩溃”。⁸全面抗战爆发，尤其南京失守后，各方人心起伏不定。龙云此电既表示其抗战决心，实则也有探查国民党中央政治态度之意。蒋介石复电称“中枢同人，对既定国策，绝对一致。并请详为解释为荷”。⁸事实上，在27日的国防会议上，“讨论敌人所提条件，多主议和”，致使蒋介石感慨“本党老糊涂亡国元老之多，此革命之所以至此也”。³蒋介石复电，既是安抚龙云以取得支持的行为，也希望借此减少各方对国民党中央高层分歧猜测之意

图。

其时，日本也向蒋介石提出议和条件。1938年1月2日，蒋介石认为“倭寇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应即严拒”，同时思考“万一武汉失陷，退守川黔，则国内变化与倭寇压迫之推想”。³在此形势下，各实力派的态度十分关键。1月2日，蒋致电龙云：“抗战前途，益形严重。……国际方面，对我仍表同情。惟因欧洲局势多所牵制。现正尽力运用，以待国际间之转变。吾兄关怀大计，于国家前途，必有明确之观察，卓见所及，尚希详示”。8月4日，龙云复电称：“至和议一层，查我原未绝交宣战，第三国出面调停，在理在势，均似均未便拒绝。惟敌方条件异常酷辣，贸然言和，不但国际形势为之动摇，国内亦难免发生重大影响。愚意□□□□□□□□□□□□□□□□考虑和议。否则，仍惟准备继续周旋”，⁸此时川情复杂，蒋介石不希望云南再添变数，对龙云极为客气。就重大外交决策征询龙云意见，既表现开明的集思广益态度，也含有信任、尊重龙云之意。龙云的回复亦谦恭。双方虽各有揣测，但关系尚属良好。

1937年11月国府西迁重庆后，龙云于12月24日专门拜访周钟岳，谓国府西迁重庆，云南省政府宜派人到渝慰问，表示拥护国府、坚决抗战之意，希望周氏能够代表云南方面前往重庆并陈述下列事务：一，国民政府中央既定之抗战政策，不论前方战事如何，不宜中途变更，以避免内外纠纷；二，云南始终拥护国府既定之抗战政策；三，云南军队除六十军外，可再派出两军出滇抗战，将来龙云亦可亲自督师前往；四，滇军出师相关费用虽由云南筹备，但国府中央应知其困难；五，希望云南省府人员参加盐务管理局，使之明了相关费用之实际开销而好预计财政；六，滇川铁路由国府中央议定开办，由云南承担500万元，云南方面可以解决，但要明确核实传闻中成渝铁路修筑款项来源；七，滇缅公路已由中央决策，云南方面当尽力督办；八，关于修筑叙昆段驮运大路的具体事宜应明确；九，见到林森时，对于发布唐继尧国葬事宜表示感谢；十，云南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大学，其原来由云南承担的经费仍将继续担任，贵州无设大学基础，将来可把云南大学或改为滇黔大学，设一分院于贵阳。此外，还有与国府当局商讨中央机关及川滇两省合作等事宜。12周钟岳于1938年1月抵达汉口，卢汉在1月13日向龙云汇报了周氏的行程及蒋介石以韩复榘未奉命令擅自撤退为由将韩氏扣留查办的情况。⁸其后，周钟岳先后与张群、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林继庸等人会晤，商谈了军事、政治及经济机构诸问题，在1月19日得到蒋介石会见。周钟岳向蒋介石转陈了前述龙云的相关嘱托事项，得到蒋介石称赞：“龙主席公忠体国，至为钦佩；将来能再派一两军参战，尤所盼望，惟滇省为重要国防，龙主席仍应坐镇，不必亲出督师。至所商归并运署及修筑滇川铁路、滇缅公路、充实大学等事，当转告主管各机关，妥为办理”。¹²

2月20日，时值昆明航空学校举行毕业典礼，蒋介石委托龙云代其出席并授予文凭，并称：“以后关于航校诸事，请兄(指龙云，引者注)代中时常视察，指导一切。对于军风纪，尤希特别注重整饬为盼”。¹³蒋介石的这一安排，虽属事务性的部署，但从语气上表现出对龙云的信任与倚重。这一态度，与前述他迫切希望云南出兵抗战有密切关系。

蒋介石迫切希望云南能多出部队抗战，而川事在刘湘逝世后又陷纠葛，为稳定西南政局，更需龙云支持。4月21日，就王缙绪任四川省主席、潘文华为川康绥靖副主任、刘文辉任重庆行营副主任、王陵基为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一事，蒋介石专门致电龙云，言上述计划可使四川内部稳定，询问“兄意以为如何”。¹³早于20日，蒋介石因临沂失陷，故令“滇军留台儿庄”。³蒋介石在21日致龙云商讨川事的电文，显然是对龙云的示好与尊重。4月25日，蒋介石一方面计划将“川令通知志舟”，一方面也计划“催滇、粤出兵”。³

这一时期，蒋介石与龙云虽然在出兵步骤、出兵时间等一些具体问题上未达成一致，但整体上互相表示了尊重，表面上呈现出一种友好的关系。但伴随全面抗战及各方形势的不断变化，蒋、龙的矛盾与猜疑不断加深。

三、蒋、龙“各有所求”：1938年7月龙云武汉之行的政治内涵

滇军在台儿庄战役中表现英勇，但伤亡亦重，六十军“奉令缩编为一师”。⁸而龙云认为“应恢复三师建制”⁸，同时询问卢汉“李既十六号离徐，该军何以十九号始行撤退？是否事起仓猝？李未及下令，抑系有意为之？”又问，“此次徐州会战部队达数

十万之众，李、白措施如何?有无错谬意存私见之处?”⁸ 龙云对滇军在前线的处境及战况担忧，对作战部署心有猜疑。其时，蒋介石面临的内外压力甚大，对内仍决定采取所谓“团结内部，委曲求全”之策，³ 对龙云以笼络为主。6月7日，蒋介石致电龙云，称：“务望兄处第二期部队提前出发增援”，并邀请龙云到武汉“面商一切”。¹³ 蒋介石不断催促出兵，但龙云以军械不充分为由应对，蒋则表示军械可由中央补助。龙云在11日致电卢汉，称：“惟查中央部队颇多，若俟我军到齐后始行具领，则恐临时掣肘，不敷分配，坐误事机”，要求卢汉就近先向蒋介石及军政部代领军械存储起来。⁸ 龙的布置表明了蒋、龙的互不信任。

就龙云赴武汉一事，卢汉在6月12日致电龙云，称：“此行关系于滇省之地位增高与恒[国]家前途者甚大”，劝其“毅然驾临”。⁸ 卢汉这一劝电，有其自身之考量。蒋介石在9日下令，升卢汉为第三十军团军团长。⁸ 笔者目前未见到蒋介石此前与龙云商量的相关文献，仅见蒋介石在14日致龙云的电文，称：“兹任命卢汉为第三十军团军团长。除分电给委外，特电知照”。⁸ 对于地方实力派而言，军事实力是其根本，蒋的这一任命虽然提升了滇军六十军地位，但同样也会削弱龙云对六十军的控制权。当事者卢汉对此自然小心翼翼，曾专门向龙云请示是否可以就职，而其劝请龙云赴武汉，也有让龙云亲自了解六十军具体情形之意，以避免矛盾。在此形势下，龙云自然不能不让卢汉就职，他在13日回复卢汉，称：“电邀赴汉，意义重大，亦知与寻常不同”，表示等五十八军准备就绪即可赴汉；另外，“委座即明令以弟(指卢汉，引者注)任军团长，望即遵令就职。至此后续部队如何统辖，系统如何规定，想委座自有计划，勿庸顾虑”。龙云虽对卢汉言“勿庸顾虑”，但涉及部队统辖诸事，其不可能真由蒋介石完全决定。事实上，龙云对出滇参加抗战滇军的控制权十分重视，向卢汉表示后续滇军到达后，可以编为3个军，军长人选卢汉可以建议，但仅作为参考，最终由龙云自己决定。⁸ 围绕参加抗战滇军的控制权，成为了龙云、蒋介石博弈的一个关键问题。由于龙云在后续出兵、赴武汉面谈问题上不积极，蒋介石内心日渐不满，开始由前期的不断称赞而逐渐抱怨。在6月2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注意”项中的第一条就称“滇龙态度为抗战以来惟一不力，而且妨碍也”。³

伴随抗日形势的严峻，日本不断发动心理战术，散播“西南将与中央脱离”关系的谣言，⁸ 引起各方猜疑。在此形势下，蒋介石迫切希望龙云赴汉以破谣传。蒋介石除了电催龙云本人外，还不断让卢汉催促龙云尽快继续出兵并亲赴武汉。卢汉虽以“滇省系后方重镇”，龙云以不能暂离职守为由答复蒋介石，但同时也劝告龙云消除顾虑，亲赴武汉以“使敌方无从再事挑拨离间”。⁸ 对于卢汉建议，龙云回电言：因一直从事后续出滇部队的编制与补充工作，故一直未能赴汉，但昆明同人“无不一致赞同前往”。⁸ 揆诸客观，龙云对亲临武汉不可能不有所顾虑，以卢汉对云南政情及龙云性格之了解，其言并非空穴来风。龙云的回电仍避重就轻，并未明说何时入汉，反现其心中的迟疑不决。

不过，在反复权衡利弊后，龙云还是于7月19日到达武汉。而7月18日，蒋介石还在思考对“川滇办法”。³ 龙云入汉，蒋介石在19日的日记中，称：“此为内部精神统一之表现，使寇敌遭受打击甚大也”，³ 龙云此行的政治意义甚大。7月21日，蒋介石专门思考“对志舟应说之话”；³ 23日，蒋、龙会谈达两个小时以上；24日，蒋与王缙绪、龙云“各别谈话甚久，会报如常”。³ 所谈时间较长，则商谈内容也应较为深入。26日，蒋介石“晨访龙云，云犹未起”。¹⁴ 这些细节，说明蒋介石对龙云此行相当重视。

蒋介石一再强烈邀请龙云入汉，与当时的复杂形势有着密切关系。1938年初，日本发表宣言，声称不再以蒋介石为对手，而愿与各省政府主席签订平等条约，协助中国“新”政权建设。杨维真根据相关资料研究，认为龙云此时曾为这份宣言所动，在1938年5月徐州大战失利后，龙云、刘文辉曾派人和1937年底在北平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王克敏投降派联系，表示欲组成川滇康黔四省联盟，发起和平运动；龙云还通过云南富滇银行派驻香港的分行经理萧寿民，与日本驻香港国际间谍盐荒互有接洽，当时有谓日本称龙云为“云南王”的传说。⁶ 前述卢汉所言的“西南将与中央脱离”的各种社会传言，即是指此。因此，龙云这次亲自抵达武汉，给予了蒋介石相当的政治支持。龙云在武汉期间，蒋介石对其之招待甚为殷勤，曾对龙言：“志舟兄此次到武汉，等于带着百万雄师来的”。张群对龙云解释称，因日本对外称中日问题不以蒋介石为对手，蒋介石恐“地方人士及抗日将士对他的威信有所动摇”，故龙云此次来汉，蒋介石特别高兴。⁹ 武汉之行，表现了龙云的抗战决心及对蒋的支持，暂时缓解了双方的矛盾。

四、蒋、龙围绕前线滇军指挥权的博弈

龙云对军权极为重视，虽然五十八军、六十军已开赴抗战前线，但其仍掌握着主要军官的任免权。在成立第三十军团后，就军团人员的升委及人选调整，卢汉都一一向龙云报告。龙云表示除副军团长高荫槐及副军长张冲由其亲自向军政部核办外，其余各员均遵照卢汉的方案办理。⁸ 龙云虽作如此表态，但卢汉十分谨慎，仍请龙云就副军团长、副军长、师长、副师长各员“迅电军政部核委，以专职责”。⁸ 这既说明龙云对军事力量指挥权的重视，也表现龙云、国民政府中央之间关系微妙，各方对滇军指挥权的布局心态复杂。

9月8日，卢汉以抗战中滇军因“中枢无人”导致被“先后分割，零星使用”为由，向龙云建议将先后前来的6个师编为1个集团军，下辖3个军，每军辖2个师。⁸ 龙云同意了这一建议。对于集团军总司令之职，何应钦、龙云及卢汉对此问题都进行了较深的考量。9月26日，滇军第一八二师副师长邱开基致电龙云，称何应钦召其询问将滇军编为集团军的具体办法，探询其由龙云兼任或由卢汉升任集团军总司令一事的意见。邱向何称，龙云“素重官阶，严明赏罚”，虽“实则属意永公”，但因卢汉刚升为军团长，又递升为集团军总司令则“恐碍中央爵赏”，故有所担忧。考虑国民政府及云南地方实况，建议由龙云兼任集团军总司令，而以“永公副之”。⁸ 这从另一层面折射了滇军集团军总司令职务任命的微妙。

蒋介石及何应钦本有意将集团军总司令职务委任给卢汉，这有利于对前线抗战滇军的直接指挥，但又恐引起龙云不满，并且卢汉的态度也十分谨慎。邱开基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及云南地方任职，对各方复杂情况颇有了解，其建议既关照了龙、卢及国民政府中央各方之关系，也避免引起矛盾。何氏询问邱开基，而邱氏以副师长之职直接致电龙云，某种程度上也是国民党中央就此事对龙云态度的试探。龙云次日回复称：“集团军总司令之职，如中央认为卢永恒[衡]甫就军团长，即予升充嫌过速，且卢军团长现又兼有军长责任，有窒碍时，则集团军总司令可由余兼任。否则，仍以直接发表卢永恒[衡]为是。望即转达何部长。”⁸ 龙云之词虽然委婉，但实则表明其有意兼任集团军总司令的态度，目的是为了牢固控制这支在外的滇军。国民政府中央对此也心知肚明。29日，邱开基回复龙云，称：“奉谕已于感日电请钧座兼任总司令，惟恐钧座一时不能亲临指挥，故以永公为副。倘钧座能启节督师，则中央当以更崇高之名义倚重钧座，籍挽危局”。⁸ 蒋、何虽有削弱龙云对前线滇军影响之意图，但也不敢激化而引起矛盾。9月底，国民政府正式下令将抗战滇军编为第一集团军。10月1日，下令由龙云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¹⁵ 然而，由于第一集团军归属第九战区司令薛岳指挥，薛岳曾担任过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为龙云下属，若此则龙云面上不适当，故龙云很快又要求由卢汉担任集团军总司令，由高荫槐任副总司令。¹⁶ 龙云虽力图控制前线滇军，但各方在滇军人事布局上的矛盾则日渐突出。

10月17日，卢汉就致电龙云，称五十八军孙渡部抵武汉后对改编不满，导致何应钦“疑滇军内部意见分歧”。卢氏言滇军内部“裂痕已生”，“万一力与愿违，惟有让贤，以免误国误滇”。⁸ 这一情况的产生，既有国民政府中央与滇军各军官密切接触，对五十八军相关军事行动“直接电令”，⁸ 以各种方式分化滇军的缘故，亦与其虽系前线滇军最高军官，但无最后决策权有关。“让贤”之语，实则也含有一定委屈或不满的情绪。接电后，龙云要求“以后五十八军一切命令承转，对中央或本省应概由军团长核转，以资统一，而免分歧”。⁸ 对于国民政府中央直接指挥滇军行动的情况，龙云的态度十分强硬。10月18日，龙云急电卢汉，要求尽快成立集团军总司令部，以方便其有效指挥滇军。对于蒋介石直接电令五十八军开赴崇阳的行为，认为“此项电令若未经转飭，殊非正办”，要求“务须即日负责确实掌握指挥”，“以后凡未经转令，无论任何命令，不能直接接受，以维军纪，而遵绪统”。⁸ 此电是对孙渡于15日向龙云汇报蒋介石直接催令其率部开赴崇阳、蒲圻两处集中的反应。⁸ 龙云在17日指示孙渡，要其一切行动“请示军团长办理，如直接奉命，诚如来电所云，势必分割，孤我势力”，以后无论“任何来电调遣，应据理呈明，以维系统，而便缓冲”。⁸ 龙云对蒋直接指挥滇军的行为十分不满，抵制态度也相当强烈。为表明其态度，龙云于18日致电军令部长徐永昌，称五十八军“开拔崇阳，实属困难”，直接言“该军早奉明令，拨归卅军团指挥，以后一切命令均应由该军团长转飭遵办，以维系统，而免紊乱。并请飭注意为荷”。⁸ 龙云的这些强硬措辞，使蒋介石意识到稍一处理不当，即易引发矛盾，故亦在18日专门致电龙云，称同意龙云之意，“第五十八军已令归卢汉代总司令指挥。该军所缺无线电亦令照发”。

8

龙云要求部属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对滇军军事指挥权十分重视和敏感，这是乱局形势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真实面向。蒋介石虽对龙云相当不满，但格于形势，也不得不对龙氏作出妥协以维持团结景象。围绕军事指挥权的博弈，使龙云武汉之行

后与蒋介石矛盾的短暂弥合之势再度破损。龙、蒋围绕滇军军事指挥权的博弈，在全面抗战时期一直延续。

五、汪精卫出走加剧蒋、龙关系变化(1938—1939)

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的重心转移于西南地区，龙云与蒋介石在政治、经济、军事权力诸方面的摩擦亦随之增多。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自重庆飞抵昆明，并于19日由昆明出走河内。这一事件发生后，龙云与蒋介石彼此的猜忌更深，自此未再弥合。

武汉会战失利，国民政府面临的形势危急，内部分裂形态更加突出。卢汉观察言：“现国家前途如许严重，和既不可，战又不能，而党派之间磨擦益甚，初未尝以当前国难稍泯其自私自利之心。年余抗战之结果，文治多主和，军人多主战。但究其实际，主和者徒懦于危难，主战者亦非其本心。以职年余之观察，高级者既鲜指挥之能力，下属者又无必死之决心”。⁸这一分析深刻呈现了武汉会战后国民政府主和、主战分裂之情形。以汪精卫为首的主和派与日本一直存在联系，龙云、潘文华日常亦与汪精卫有所联系，坊间多有传闻。1938年12月5日，蒋介石“闻川滇潘(文华)、龙(云)与汪勾结之谣传”，但决定“姑置之”。¹⁴而在12月16日，龙云专门派遣龚自知携其亲笔信到重庆面呈蒋介石，“要求款械”，表示忠诚于蒋，蒋则专门回信“勉慰”。¹⁴因武汉会战失败，蒋介石内外压力更大，日本亦不断发动宣传攻势，蒋既希望龙云坚定支持其抗战，又担心龙云与汪精卫靠近，12月17日还“以龙云态度不明为虑”。¹⁴未料，次日汪精卫就到昆明，并于19日出走河内。⁶这使蒋对龙云疑虑更深。

在汪精卫19日离开昆明当天，龙云曾致电蒋介石，称：“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昨夜及临行时，两次电详呈”。¹⁴蒋得知信息后，认为“此事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藉口不愿与共产党合作，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于21日致电汪氏，称：“闻见到滇后感不适，未知近状如何，乞示复”。¹⁴蒋试图采取缓和的态度稳定汪精卫，以争取其改变计划。12月22日，龙云再次致电蒋，称汪精卫临行之时，“明言与敌倭有约，到港商洽中倭和平事件”。¹⁴对于汪精卫此举，蒋介石深感愤怒，称：“不料其糊涂卑劣至此，诚无要救药矣”，但也在判断其影响，对“党政军以及各地之关系应特加审慎”。³

蒋介石对汪精卫出走的影响思虑甚多。23日，他思考“广东军人是否受汪影响？”“政府内部受汪影响之人几何？”³虽然蒋判断“汪确有整个背叛党国奸谋”，要打破其“抗战计划”，一度“决心发表宣言，使其卖国奸计不售”，³但最后还是决定采取稳进方式，以尽量争取各方支持。12月25日，蒋致电龙云，称：“此时吾人均宜为汪先生(指汪精卫，引者注)宽留余地，故马电转述彼(指汪精卫，引者注)言与某有约云云，拟与兄暂互守秘密，勿为他人道。想兄亦同此意也”。¹⁴蒋不愿意刺激汪，还希望汪能够回头，故言为其“宽留余地”。

龙云对汪精卫的态度较为复杂。12月22日，龙致电卢汉，语涉汪氏在滇言行，称：“汪先生前日到滇，昨赴港，愿效昔之李鸿章、今之张伯伦，与日方直接商洽，不顾一切，力主和议，加入防共协定。因在渝受人攻击，蒋、汪之间亦未尽同意，故谓成则返渝，否则不再返渝，云云。语气愤慨，大有各行其志之慨。大局如此，兄闻之忧心如焚，党内纠纷从此又开始矣”。⁸汪精卫与龙云长期保持联系。⁶从龙云之语可以观察出，汪在昆明较为直接地向其阐述了政治主张，并言及国民党高层派系分歧，明确表示“成则返渝，否则不再返渝”。从对汪的称呼而言，龙云对其较为尊重，但又在汪氏离昆当天即将这一信息报蒋。这一举措，表明龙对蒋、汪态度的游移。客观上，汪精卫此时仍是国民党二号人物，龙虽然知晓汪氏离昆目的，但就其地位而言，自然无法干预汪氏之行动。卢汉对龙的政治态度及心理十分了解，在回电中对汪氏离滇行为并未直接言及，仅称高层纠纷不断，“艰危之局，非一二领袖独当其冲所能济事”，⁸含有劝解龙云不要轻易选择同意汪氏个人主张之意。结合卢汉此时身在抗战前线，并与蒋接触颇多的情形，其在对日态度上更倾向于支持蒋氏，但蒋、龙关系复杂，而其与龙又关系微妙，其措辞相当谨慎。

龙云对汪精卫由昆明离滇可能引起的诸多连续效应十分清楚。就前述蒋在25日的指示，他于28日复电，称：“钧座(指蒋介石，引者注)与汪先生既同时在渝，此种国家大计，而晤谈时，几未提出开诚相商，遽然离渝，足证其此行另有怀抱。此刻惟有照钧座电示，除代彼宽留余地外，一面迅谋挽救，以免误己误国”。¹⁴此电含有自我辩解之意，龙当然能够判断出汪由昆离

滇，必引起蒋的猜疑，但他未直接解释，而称汪与蒋同在重庆但未就抗日问题进行具体商谈，自是汪另有谋划的表现。换一视角，汪长期在重庆，蒋本人都不了解其真实的对日态度，而汪氏经云南时龙云未采取阻止其离昆的措施，自然有了合理逻辑。经龙云的解释，蒋对龙的态度渐有变化，日记中称“云南态度最近亦有进步”。³ 龙云建议蒋介石对汪精卫“迅谋挽救”。蒋介石认为：“滇龙对汪之处置意见应予考虑，但汪不可救药矣。”³

蒋对龙虽充满怀疑，但未将其置于汪派嫡系看待，然对“云南动态”³ 仍十分关注。当日本广播宣传云南消息时，蒋在 1939 年 1 月 20 日的日记中称“敌广播忽传云南忠于中央之消息，岂汪与敌勾结如此之深，乃可使敌之宣传更改其方法乎”。思考“敌与汪勾结已深，而滇省是否受有影响，汪之背景何在，皆不得不研究也”。³ 其时社会各界舆论对云南多有猜测，蒋怀疑日方此举是配合汪精卫缓解云南舆论困境行为，转而对龙云的疑虑更深。1 月 23 日，蒋介石就对龙云表现出强烈的猜忌情绪，甚至将前述龚自知到重庆进行的活动，都视为与汪精卫勾结的行为：“滇龙派其教育厅长龚自知来渝，携函要求款械，各为慰问，余亦以为真，而其实受汪诱，与之勾结也。次日汪即潜行赴滇，可知龚来汪行，早有预谋也”。蒋之不满，是 1 月 15 日，“在汪戚陈昌祖在逃之皮匣中，发觉龙覆汪函”。蒋认为龙在函文中，“称汪为钧座，而称中央为重庆方面，其间有现日方虽内阁改组在，而政策不变，我方似存幻想，毫无其他办法。不久大战重开，静观如何应付，此刻钧座暂守缄默，甚为得宜。至于钧座所主张各节，将来必有实现之一日也等语”，对此甚为愤怒：“人心难测，如此诚为世道国事寒心也”。³ 不过，在汪精卫出走河内后，龙云虽然态度有所犹豫，但在 5 月 2 日还是在云南各报刊刊登了由国民政府中央代拟的的谴责汪精卫的函文，使因汪精卫出走而引起各方关注云南形势的风波暂时平静下来。⁶

然而，蒋介石虽然公开表示尊重龙云，但内心对龙云的不满意日深。12 月 30 日，蒋在日记中称：“滇龙态度犹豫暧昧，然无识无胆，不足虑也”。³ 在次日的“本月反省录中”中，蒋介石又称：“滇事处置以先严后宽为主旨，似得效果”。³ 这一方面说明蒋对龙已基本放心，但较汪出走之前，态度已发生根本转变。另一方面，因汪由昆明出走，各方对龙云行为亦多有猜测，又强化了蒋对龙的猜忌心理。当时，滇越铁路具有重要的战略交通功能，日本不断派飞机轰炸，蒋一面责备“滇龙(云)不肯派兵保护”，引起外人怀疑龙与敌人“暗有默契”；一面也对有人言龙云“愿将此路炸断，以免敌军扰滇”的猜测表示“言之太过矣”。¹⁷ 这种矛盾心理，从另一维度说明了蒋、龙之间原有的本不牢固的“亲近”心理已逐步消磨殆尽。在 1940 年 3 月 26 日，蒋仍在注意“龙之态度与汪之关系”。³

六、走向破裂：全面抗战时期蒋、龙政治、军事博弈的终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尤其是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蒋介石一方面通过各种措施笼络龙云，一方面又不断加强对云南的渗透，削弱龙云对云南的控制力。在 1939 年底，蒋介石决定在昆明设立军事委员长昆明行营，借此名义既可加强对云南军政的统合，又有利于营造团结抗日的气氛。1939 年 12 月 8 日，蒋介石专门致电龙云：“关于昆明行营事，最好能于本周内发表。惟其内部组织是否用副主任或参谋长名义，似应事先商定，因时发表。使发表后即时就职，以免敌方造谣也”。⁸ 蒋介石所言内部组织用副主任或参谋长名义，实际上指卢汉职务的任命问题。其时，卢汉因生病回昆明休养，但卢汉在前线作战与蒋介石多有接触，蒋介石对卢汉的关心，既有提高卢汉政治地位之意，但私心亦有分化云南内部的图谋。龙云回复表示，“关于昆明组织行营一节，职自当遵照钧命办理，请即予发表，遵即就职”，但卢汉既在病中且“前方尚有职务”，故“目前委以副主任或参谋长之职，似均可不必”，若“将来必须其到黔时，再为另案办理”。龙云是到 12 月 20 日才回复蒋介石，其间时间甚长，其理由是卢汉到昆明后“卧床不起，精神虽佳，而创口疼痛，不能行动。故职于昨日始得与其详谈一切，致复钧电稍迟”。⁸ 龙云回复迟缓，虽有其客观理由，但其实是在考量蒋介石设立行营及任命卢汉职务之用意及其可能的利弊。蒋介石在各地设立行营已有前例，理由充分，龙云自然无法拒绝，而对龙云本身而言，亦未尝不可借昆明行营主任名义加强对云南军、政事务的统治。但龙云对蒋介石准备任卢汉为昆明行营副主任的打算颇多顾虑，意识到此为蒋分化、制约云南内部的举措，故并不同意。

蒋介石、龙云之间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产生矛盾，而且在前线滇军控制权方面，如前曾述，双方博弈一直不断。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卢汉自 1939 年初回昆明休养后，集团军总部事务由副总司令高荫槐负责，但高荫槐对集团军的人事、经济无权过问。第一集团军的人事调动，经常不经过高荫槐，而由警卫团长陇耀直接向昆明提出建议人选，即由卢汉电令调整团长、营长，陇

氏渐成为掌握滇军前线部队人事的核心人物，日渐产生派别之分歧。高氏由此对卢汉不满，发牢骚言：“帮卢家老板看铺子，看了好几年，这些小哥弟在乱搞”。当时，部分将领认为卢汉久病难愈，即使病愈亦难负责领导。在这样的形势下，第一集团军的上级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遂对滇军内部高级将领进行分化。其时第五十八军军长为安恩溥，第六十军军长为孙渡，新三军军长由高荫槐兼任，第五十八军下属新十一师师长鲁道源等人，彼此都存在矛盾，薛岳、罗卓英遂对他们进行挑拨。高荫槐试图脱离滇军，另立门户，曾派新编三军副军长赵锦雯到重庆见面蒋介石活动总司令头衔，蒋介石专拨 10 万元特别费予高、3 千元予赵，以示笼络。16 前线滇军内部不和，引起龙云警惕。1940 年 2 月 7 日，龙云专门给高荫槐、孙渡、安恩溥、赵锦雯等人致电，强调“两年以来，吾滇因外来之人增多，人事复杂，生活高涨，省防亦加紧。一切庶政，比较以前，应付困难，几加十倍”。龙云所言“人事复杂”，表现了国民政府中央相关机构入滇后，云南与国民政府中枢关系的复杂。龙云以唐继尧时代驻粤滇军内斗为例说明团结的重要性，称：“曩者，在外滇军，因不识大体，内部无团结，致被人利用，互起猜忌。不但个人失败，且使滇军声誉一落千丈。此则所宜引以为鉴者也”，要求各人“务须一德一心”。龙云同时还称薛岳与其相交甚深，“如同手足”，各将领“务当秉承意旨，忠实服务。倘不明此旨，各怀意见，外人乘机挑拨，有失团体，贻人訾笑”。⁸ 此电指向甚明，明眼人都可以观察出龙、薛二人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政治派别与利益，实则是提醒前线滇军与国民党中央嫡系将领交往应慎重，免为对方所利用。龙云此电，说明其与国民政府中央争夺前线滇军控制权的博弈已相当激烈，才不得不公开发电提醒滇军将领注意云南地方团结意识。然而，龙云此举也并未能达成滇军团结一致的目标。

此前，蒋介石亦曾意图任命赵锦雯为新三军军长，去电征求龙云意见，为龙云反对。龙云另提出杨宏光任新三军军长，李文彬任第一八三师师长。¹⁶ 蒋介石于 1940 年 5 月 13 日同意这一任命，称：“高荫槐准辞新三军军长，专任一集团军副总司令职，杨宏光准升代新三军军长，李文彬准升新一八三师师长”。⁸ 龙云这一举措，将高荫槐架空，将原来第一八三师师长杨宏光升任军长，将李文彬提升为师长，试图稳固对滇军的控制权。在这样的形势下，6 月 19 日，蒋介石调赵锦雯为军事委员会中将高级参谋。⁸ 高荫槐曾于 1940 年 9 月 1 日以生病为由，向龙云请辞，未能获准。⁸ 这些复杂的人事任命，正是龙云与蒋介石博弈之结果。1940 年底，第一集团军将总部设于昆明，将原来在湖南的集团军总部改为副总部，这是龙云加强对滇军控制的举措。然而，龙云虽试图继续控制前线滇军，但在时局变化下，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目标。前线滇军中，孙渡、鲁道源与薛岳日益走近，第一八三师师长李文彬、新十二师师长张与仁亦与蒋介石、薛岳保持联系，高荫槐事实上也想另立门户。鉴于这样的情况，龙云向蒋介石提出调换李文彬、张与仁，另派潘朔端为第一八三师师长、邱秉常为新十二师师长。蒋介石同意龙云的人事建议，但高荫槐联合薛岳，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辞，拒绝潘、邱二人到职。同时，薛岳以新十师失守九龄为由，将师长高振鸿拘捕并移交军法审判，被判 12 年有期徒刑，借警卫团长陇耀杀死王世高妻子事件，将其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薛岳还公开发电称：“要芟除新旧派别之妖言，剔除经济不公之积弊”，事实上是指责卢汉治军人事、经济不公开。如此，滇军第五十八军、新三军事实上已非龙云所能完全控制。¹⁶

龙云任军事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名义上国民政府中央在滇部队及部门均受其节制，但实则龙云根本无法指挥国民政府中央部队。此时，因第五十八、六十军及新三军均出滇抗战，云南地方内部空虚，龙云对此较为担忧，遂扩编军队以充实自身力量。在 1940 年之前，除在前线作战的 3 个军外，云南另编成 7 个步兵旅、14 个步兵团，分别由卢浚泉、龙绳武、阎旭、马继武、邱开基、龙燧垣、万保庶任旅长。¹⁶

1940 年 8 月 31 日，蒋介石认为“滇龙始傲终服，对边人不能不用威以制之，仅用德怀，则不足矣”。³ 蒋一方面对龙云表示笼络，但也决定采取一些措施，加强对其之威慑。中央红军进入西南时，蒋介石就有派遣国民党中央军进入云南的企图，但一直为龙云所抵制。¹⁸ 在抗战全面爆发初期，国民党中央军也未能进入云南。在日寇进攻桂南并侵入越南后，中国经过越南的国际交通线被截断。为保卫云南大后方及滇缅国际运输线，除前述蒋介石同意抽调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率领第六十军的一八二、一八四两师返滇外，还让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率领第五十二军由湖南经广西进入滇南，沿滇、越边境布防，同时还同意由卢汉在云南新成立第九十三军。至此，国民党中央军首次开始进入了云南。¹⁹ 对于国民党中央军入滇，蒋介石在 9 月 24 日日记中的一段记载，颇能表现双方之各自算计。蒋介石分析了龙云行为的心理，称：“滇龙一面听命中央抗战，一面对香港报界发表谈话，表示云南本省兵力充足，不须外省援助，故意令倭敌知其心境。期望倭不攻云南，而更怕敌机轰炸昆明，故不借示倭寇以我内部不一致之弱点，其愚拙可谓极矣”。同时，也分析了龙云对于中央军入滇的态度：“其对于中央军已入滇境，亦不

明拒”。对于龙云的这一措施，蒋介石决定“将计就计”，即“对龙不加斥责，亦不令其声明改正。以重复声明，更着痕迹，不如放任一步，听其自然。可知敌疑虑龙之谈话为中央授意，或亦可使倭不即攻炸云南，此亦害事利用之一矣”。³ 蒋介石的此一记载，充分表现了其与龙云之间的复杂博弈情形。

伴随蒋介石对云南虎视眈眈，步步加紧控制，龙云的政治态度也发生转变，由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的“亲蒋”开始转而联合各派力量与蒋介石展开博弈，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的政治态度变得逐渐开明。1938年，长江局派薛子政、周时英、张天虚等人到滇军第一八四师张冲部工作，积极在滇军中展开工作。1942年，南方局派遣张文澄来昆明，负责联系滇军中的党组织。而在1941年时，中共中央专门派遣朱家璧回到云南，在滇军中先后任营长、副团长、团长等职，一方面在滇军上层将领中进行工作，一方面与所在部队党员和进步人士一起开展抗日宣传。20在抗战全面爆发后，西南联大内迁昆明，一些民主人士亦来到昆明。龙云虽不直接参与民主运动，但采取同情态度，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蒋介石对此亦十分不满。21 蒋介石曾在日记中称：“滇龙与中共态度渐佳，而滇龙当必悦服耳。”³ 1942年2月，蒋介石到达云南，称：“云南政治与上下关系，不见有何进步”。³ 蒋介石对云南政治状况、云南地方势力与国民政府中央关系发展十分不满，但云南对于抗战十分重要，对龙云的处置不得不相当慎重。在这样的思路下，其与龙云的矛盾虽日益尖锐，但尚不敢遽然撕裂。不过，在内外多重因素影响下，蒋以武力“统一”云南的心思一直存在。¹⁹

蒋介石虽然一直对龙云优礼有加，并表示相对尊重，但此仅是一种政治策略，并非内心真意。当杜聿明所部第五集团军开入云南时，蒋介石要求杜氏对如同服从他本人一样绝对服从龙云，“你们为了前途，为了整个计划，也要委屈求全，不要发生摩擦，影响国家大事”。但其实，蒋对龙云实际上已相当不满，暗中布置特务、准备实力，在滇缅公路局、滇缅运输处及昆明防守司令部等机关、部队中都设有军统的特务组织“调查室”，在滇、黔及滇康边境都驻有重兵，随时准备武力解决龙云。¹⁹ 在抗日战争逐步走向胜利之际，蒋介石解决龙云的意愿越来越迫切。1945年7月，蒋介石在思考“云南问题与人选”时，认为可接替龙云的人选主要有卢汉、杨耿光、高荫槐、孙渡。37月21日，直接称：“对滇龙之不法行动，应彻底解决”，并就“撤换滇龙”作如下准备：“沾益之部署”“南路开化铁路之部署”“人事之准备，卢汉与李宗黄”“劝导之人选，子文、惺甫”“命令方式”“电稿”。38月25日，蒋更明确地在思考“滇龙撤换日期”。³ 此时，蒋介石解决龙云的思路已经形成，只不过仍在思考具体的时间表及实施过程。

在1945年8月日本准备投降之时，蒋介石召见杜聿明，要求其“先回去做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¹⁹ 经过周密计划，蒋介石将“改组云南省政府”列为10月份的重要工作内容。310月2日，蒋介石分别给杜聿明、卢汉写信，并与宋子文见面，宋子文还以恐怕影响美国对华借款主张暂缓改组云南省政府，但蒋介石认为“若不于此时撤龙，则今后共毛如回延叛乱，或东北问题不顺时，则更难撤换矣。要在乘此内政渐安时，先将西南基础奠定，而后建国平乱，对内、对外皆有运用余地。至于美国借款之事，与此相较，实不值一计”。³ 蒋介石早存解决龙云之心，一直为此部署准备，虽然宋子文向其建议暂缓行动，但仍未能改变其计划，决心已相当坚决。2日当天，蒋介石还派遣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关麟征、李伯英等飞赴昆明，行前还专门对他们“面授军政处置机宜”。32日晚上至3日凌晨，杜聿明等人出动军队，控制昆明各要地，向龙云宣布解除其云南省主席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龙云表示拒绝接受，并由公馆避入五华山云南省府，希望借助滇军力量挽回局面，但最终在越南的滇军不能返回，驻昆滇军无法与国民政府中央军相抗衡，被迫于6日离开昆明，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²² 至此，蒋介石与龙云的关系完全破裂。

七、结语

九一八事变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后，边疆地区在国家建设战略中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战略地位，关乎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之关键的呼声成为各界精英人士的共识，边疆在国家建设中的关键作用为国人所重视。

不论是西南边疆地区还是西北边疆地区，民国以来都经历了地方实力派割据称雄的历史场景，虽然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各实力派先后被纳入国民党政权的统治秩序之内，但均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一定的自主性或独立性。如何将这些相对独立的

方实力派完全消解，建立实质性的统一政权，这是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追求。国民党政权的这一政治追求与各实力派维持自身势力范围的利益诉求之间自然产生了矛盾，但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蒋介石忙于国民党内的层政治角逐和“围剿”红军的反动行为，与各边疆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张弛尚有较大空间。

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南边疆成为战略大后方。在1934年底国民党中央参谋团入川及1935年蒋介石改组黔政后，滇川康各实力派就备感压力，尤其国民政府西迁后，国民党中央力量在西南达到新的高度，原来相对平衡的关系逐渐打破。这一过程经历了复合的多元立体演进历程：其一，国民政府中央力量在西南的强化打破了此前各实力派对各省事务完全自主的格局，使央地矛盾更趋突出；其二，这也使国家统一力量达到新程度；其三，国民政府中央也需要团结各实力派，积极参与抗战，形成全民民族抗战的形势以保存国家。在这错综复杂、多元因素交织的场景中，龙云与蒋介石关系的演变正是这一复杂格局的映照。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云南虽然服从于国民党政权，但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自成一体。1935年中央红军进入西南，国民党中央力量也趁机向西南渗入。不过，在龙云的周密部署与精心经营之下，国民党中央力量对云南的影响较弱，云南仍处于半独立的状态。然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中央力量对西南区域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的影响日深，与滇川地方势力之间矛盾也日渐突显，在政治、经济诸方面都发生着激烈的博弈。如时人所言：“我们的边疆，是我国土地的一部分，我们的边疆民众，是我国人民的一部分，一切统一。”²³龙云派出滇军出滇抗战，表现了西南边疆各族人民与国家共命运的历史主线，是西南边疆与国家发展互融一体的客观内容。但是，隐含在这一宏大背景下的龙云与蒋介石的复杂博弈及最终关系走向破裂，又显现出近代国家发展与建设曲折、艰难的复杂表现。

注释

1 例如：谢本书、牛鸿宾：《蒋介石和西南地方实力派》，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谢本书、冯祖贻主编：《西南军阀史》（第三卷），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孙代兴、吴宝璋：《云南抗日战争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杨维真：《从合作到决裂：论龙云与中央的关系（1927—1949）》，台北：“国史馆”，2000年；汪朝光：《蒋介石与1945年昆明事变》，《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王建朗、王知贤、贾维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罗敏：《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1931—193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段金生：《龙云争取贵州辖制权的考察（1934—1936年）》，《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2022年第1辑；等。

2 参见段金生：《地方势力的国家参与：变局中边疆实力派的政治选择——抗战爆发前后龙云言行的观察》，《民国档案》2016年第2期。

3(11)(22)(37)(38)(46)(47)(51)(58)(62)(63)(64)(65)(93)(94)(95)(101)(102)(103)(104)(105)(107)(108)(110)(121)(124)(127)(128)(131)(132)(133)(135)(136)(137)《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24日、8月7日、10月2日、12月27日，1938年1月2日、4月20日、4月25日、6月7日、6月22日、7月18日、7月19日、7月21日、7月23日、7月24日、12月22日、12月23日、12月24日、12月31日，1939年1月7日、1月12日、1月20日、1月23日、12月30日、12月31日，1940年3月26日、8月31日、9月24日、8月31日，1942年2月28日，1945年7月1日、7月21日、8月25日、10月1日、10月2日、10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品，原件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4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16—517页。

5 张增智：《龙云如何走上反蒋拥共的道路》，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云南现代史料丛刊》第4辑，昆明：云南新华印刷厂，1985年，第48—49页。

6(67)(89)(98)(106)台湾学者杨维真也持这一观点，认为“因基于民族大义及全国人心的趋向，加以李宗仁等人覆电勉其拥护

中央，参加抗战，龙云才一改迟疑不决之态度，毅然赴京与会”。关于汪精卫由昆明出走河内这一过程的相关研究，近些年学术界讨论颇多，此处不再详述。参阅杨维真：《从合作到决裂：论龙云与中央的关系(1927-1949)》，台北：“国史馆”，2000年，第154、172页及该书注71、72、73，第171—181、171—181、188页。

7(17)(18)云南省档案馆编：《滇军抗战密电集》，内部印刷，1995年，第1、2、4、4页。

8(15)(16)(19)(20)(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9)(40)(42)(48)(49)(50)(53)(54)(55)(56)(57)(59)(60)(61)(69)(70)(71)(72)(73)(74)(77)(78)(79)(80)(81)(82)(83)(84)(85)(97)(99)(111)(112)(114)(116)(117)(118)云南省档案局(馆)编：《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上)，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3、4、5、10、12、14、15、16、18、19—20、23、24—25、29、30、33、36—37、59、63、64、72、73—74、81、82、83、84、88、89、90—92、101—103、109、126、174、178、189、193、199、200页。

9(12)(14)(68)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第2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8—139、139、142页。

10(13)谢本书：《龙云传》，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45—146页。

11(21)白肇学：《六十军鲁南抗战述略》，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第2卷，第190页。

12(41)(43)周钟岳遗稿：《惶庵回忆录四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5—147、148页。

13(44)(45)(52)叶健青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1册，台北：“国史馆”，2010年，第183页、第418—419、609—610页。

14(66)(86)(87)(88)(90)(91)(92)(96)(100)萧李居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台北“国史馆”，2010年，第103、646、674、678、689、689—690、691—692、704、714页。

15(75)孙代兴、吴宝璋：《云南抗日战争史(1937—1945)》，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5—46页。

16(76)(113)(115)(119)(120)胡俊：《近二十年来云南地方军队概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云南人民印刷厂印，1964年，第21、22、23、24、26页。

17(109)萧李居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3册，1940年1月4日，台北：“国史馆”，2010年，第14页。

18(122)段金生：《龙云争取贵州辖制权的考察(1934—1936)》，《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2022年第1辑。

19(123)(129)(130)(134)杜聿明：《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机诈权变：蒋介石与各派系军阀争斗内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272—273、274、275、278页。

20(125)郑伯克：《争取云南地方实力派反蒋起义》，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第3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8页。

21(126)孙秉礼：《云南中统组织始末》，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第3卷，第478页。

22(138)参见汪朝光：《蒋介石与1945年昆明事变》，《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

23(139)《中国边疆学会丛刊总序》，见黄奋生：《抗战以来之边疆》，史学书局发行，1944年，第1页。